

罗琼访谈录



图书馆

中国妇女出版社



1978年9月，中国妇女“四大”期间和蔡畅大姐（左一）在一起



1978年，与邓颖超大姐（左四）等合影



80年代初，在家中与康克洁（右二）等合影（左一为薛森桥）



1990年，与陈慕华同志（右四）等合影



1999年4月，与洁琼大姐在一起



1999年春节前夕与顾秀莲同志合影



1999年10月，探望自己的老师孙起孟



1995年6月，参加纪念
中共“七大”50周年座谈会的
9位“七大”代表合影



70年代与帅孟奇大姐（右二）、刘英大姐（左三）
及薛暮桥（左四）等人在北戴河



50年代初期的留影



辛劳一生的母亲



60年代初，全家
在北京颐和园合影



50年代在山东
烟台地区调研，参
观幼儿园



1979年10月，在新
疆伊犁的一个牧场调研



1988年，在首都钢铁公司参观



1998年，与老劳模申纪兰在一起



80年代中期
与张素我（左二）
率团赴香港参观
访问



1999年，与段永强
同志一起讨论书稿

目 录

写在前边的几句话	罗琼 (1)
一. 我要读书	(3)
二. 誓死不当亡国奴	(10)
三. 抗日救亡 匹妇有责	(17)
四. 到内地开展工作; 在武汉, 我光荣地 加入中国共产党	(30)
五. “当兵要当新四兵”	(42)
六. 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三次聆听毛泽东 同志教诲	(52)
七. 参加整风 学习党史	(62)
八. 投入大生产运动及居民工作	(68)
九. 写书, 编副刊	(72)
十. 三次面受刘少奇同志教导	(78)
十一. 出席七大 誓做愚公	(82)
十二. 在山东解放区办基层生产合作社	(87)
十三. 再次调进中央妇委	(93)
十四. 在全国妇联的领导岗位上	(104)

- 十五. 为开辟中国妇女运动新纪元, 我紧张、有序、
高效地工作…………… (107)
- 十六. 在全国妇联初建的日子里…………… (116)
- 十七. 妇女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 (125)
- 十八. 我出席了党的八大…………… (135)
- 十九. “两勤”方针出台的前前后后…………… (143)
- 二十. 在“大跃进”高潮中, 我也“声嘶力竭”地
呼喊过…………… (151)
- 二十一. 妇联组织不能取消…………… (158)
- 二十二. 宝贵的精神财富…………… (161)
- 二十三. 十年浩劫中的感受…………… (167)
- 二十四. 拨乱反正中的全国妇联…………… (173)
- 二十五. 中国妇女四大的主旋律是怎么形成的…………… (178)
- 二十六. 紧跟工作重点转移…………… (183)
- 二十七. 不能用“妇女回家”来解决就业问题…………… (194)
- 二十八. 在党的十二大, 我感受最深的是邓小平同志
讲的“走自己的路”…………… (198)
- 二十九. 退出领导岗位以后…………… (203)
- 我为什么要访问罗琼大姐…………… 段永强 (208)

写在前边的几句话

我今年 88 岁，为妇女解放事业忙碌 60 年，妇女工作和我的生活融合在了一起。我曾在上海、南昌、长沙、武汉参加妇女界抗日救亡运动，抗战爆发后，为动员妇女支援抗日战争而努力。

1938 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我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到革命圣地延安，到山东、西柏坡，主要是在中共中央妇委工作。

自 1949 年 4 月，全国妇联成立始，我在此工作整整 50 年，一步也没有离开过。我有幸能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在老一代革命家的培育下，一步一步前进。回顾往事，把 60 个春秋的经历记录下来，或许可以从一个人的历史来考察妇女运动发展的一个、几个侧面。以史为鉴，以史育人，似乎是我这样的老人应该向后辈奉献的薄礼。因此，我萌发了把个人经历记录下来的愿望。

88 岁也好，60 年也好，时间跨度很大，我哪能完全记清楚？要查档案，要和同志交谈，很不容易。事情凑巧，1995 年 10 月，在《婚姻与家

庭》杂志创刊10周年的座谈会上，见到了该刊的原主编段永强同志。他主动表示要采访我的生平，我也需要有人帮助，两人一拍即合。我们商定，文章采用访谈记录的形式，这样可以少受章法的限制，避繁就简，有些可以多谈，有些可以少谈、不谈。我们预计这样做进度会快些，大约两年时间就足够了。殊不知，事情进展并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访谈启动后，才发现我们对难度估计不足；再加上我因病住院，还有些要我参加而不能推掉的活动，接待新闻媒体的采访，应约撰写不能不写的纪念文章。所以，直到1999年盛夏，全书才得以初步脱稿。稿子虽然是段永强同志写的，但因为是记录我的历史，我当然要负全责。文中虽有我自己也不满意之处，但因年高体弱，无力再改，请读者谅解并指正。

本书在写作及出版的过程中得到了全国妇联党组和书记处的大力支持与关怀。段永强同志从设计提问，整理记录，到查找、补充、订正有关史料等，他都付出很多心血，我要特别感谢他。此外，还得到了老干部局和办公厅档案处同志们的帮助，我一并致谢。

今天，这本访谈录终于可以和读者见面了，我也了却一桩心事。作为一个老人，在本世纪末看到自己的国家在党的领导下繁荣富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业欣欣向荣，各族同胞姐妹正以饱满的精神迈向新的千年，我感到十分欣慰，也十分骄傲。祝愿祖国、人民、妇女、青少年的明天更美好！

一九九九年十月

一. 我要读书

段：罗琼大姐，您好！咱们计划已久的访谈工作终于可以开始了。首先，我要感谢您能抽出时间接受我的采访。咱们就按照一般的规律，先从您的幼年谈起吧！1996年6月，我在您的家乡江阴县（现改江阴市）周庄镇门楼下村，见到一位您的小学同学陈明金先生，他90岁了，但身板硬朗，头脑清楚，仍依稀记得您的乳名“寿大”。他感慨地说：“她娘蛮苦咯！”罗琼大姐，你还记得幼年时的情景吗？请谈谈您的家庭出身，周围环境，以及这些对您思想性格产生了哪些影响？

罗：陈明金同学说得很对。我母亲一生，是苦苦熬煎的一生，我也给她添了不少困难和苦楚，从1935年初，再次离开家乡，寻求革命，阔别十多年，音信不通，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才接她来北京团聚。那时母亲已被折磨得面黄肌瘦，两臂溃烂。她来京身体康复后，还是那么勤俭，连地上一条纸绳也捡起来，绕成一团，以供不时之需。1959年夏，母亲因患急性腹膜炎，并发肺炎，

告别了人世，享年 73 岁。临终前她满意地对我说：“我享了十年福！”今年正是她逝世 40 周年，我依然深深地怀念着她。

说到我的老家，你已去过，它是临近长江的古文化之乡。我幼年就看到镇上有纺织业作坊，听说城里还有纺织厂，村里有些人到无锡、上海去做工。镇上有极少数女青年到大城市上学，毕业后当了教员。这些都给我一定影响。

我是出生在一个暴发、暴落的商人兼地主的家庭。祖父徐益三，是江阴城里人，青年时代背着包袱到农村卖货，人称“货郎”，他跑遍了江阴县的许多农村，还到邻近吴县乡镇。他没有挣到多少钱，直到中年还没有娶妻成家。但他毕竟眼界开阔，思想灵活，有一年他冒着风险买彩票，中了头彩，得了 1000 块银元，第二年又买，又中了三彩，得了 500 块银元，这在当时真可说是发了大财。从此他告别“货郎”生涯，娶妻成家。城里人看不起“货郎”，他爱农村，只想在农村找个落脚地。我的祖姑妈（祖父的姐姐）嫁在江阴县周庄镇门楼下村，这是近百户的大村，大都是陈姓家族，祖姑母家当是富裕中农，和本村最大的地主豪绅（人称“大先生”，村里的事他说了算）是邻居，平时对“大先生”多“孝敬”，连我祖父去看祖姑母时，也带了外地特产去拜访他，彼此关系不错，求的是找个“靠山”。村旁就是运河，我祖父又在吴县震泽镇杂货铺当账房先生，来往方便。祖父便决定在门楼下村买田置房，娶妻生子。

我的祖母是城里人，结婚以后生了两个儿子，四个女儿，人财两旺。我的父亲徐松柏，排行老大。祖父中年得子，本来很高兴，为儿子取名松柏，希望他像长青的松柏，兴家立业。哪知我父亲先天弱智，又患多种疾病，长年卧床，什么事也不会做。长子没指望了，祖父把希望寄托在次子身上。我叔父出生时祖父已 61 岁，取名“六一”，聪明能干，学成了中医。不幸的是他和叔母结婚时，已患肺结核症。叔母怀孕时，他就死了，我的堂弟是

“遗腹子”。叔父早逝，对祖父是致命打击，一两年后祖父逝世了。我老家从此就由暴发滑向暴落。

本来祖父的遗产只要用得合适，一家生活也可以过得去。但我的祖母是城里人，出嫁时正值我祖父暴发，爱花钱，手面阔。在嫁四个姑母时，嫁妆丰盛，像金银首饰、穿戴、铺盖花了很多钱，光木器家具就有数十件，如两个柜子、一对箱子、九个大小盆、大小马桶、桌、椅、凳等等。最小的姑妈嫁在周庄镇，婆家是破落户，公婆吃鸦片，把一份家当全吃光了。我祖母就给小姑妈陪嫁从优，除嫁妆外，又陪送4亩最好的田。祖父、叔父逝世后，家庭入不敷出，靠卖田度日。

在我们这个家里，祖母、叔母、母亲，三个女人各有一本苦经，一年四季除一日三餐外，还得给父亲治病抓药，没的进，只有出。所以彼此气都不顺，几乎天天吵架。主要是叔母同祖母吵，她只要看见祖母给女儿一点东西，便使劲地同祖母吵架。最苦的是我母亲，名义上是长房媳妇，其实是给患病的父亲“冲喜”嫁来的，是一个苦力，过门就服侍病人，而且要服侍一辈子。她头一胎生的我，由于是女孩，人称“赔钱货”。第二胎生了我的弟弟，取名“才生”，寓意双关，既有埋怨他“迟到”之意，又有对他来日长成一个有才干的男子汉的期望。但是他和我的父亲一模一样，先天弱智、多病，上小学读了三年，还是一年级。我母亲一辈子伺候两个残疾、多病的人，苦不堪言。

在这种情况下，祖母决定分家，因为父亲是长子，我们多分了一亩半田，大约有十亩田左右。请医生治病抓药的钱，比吃饭穿衣的钱还多。在我的童年生活里，耳朵听的是三个女人吵架，眼睛看的是残疾人，一天到晚愁眉苦脸，家里既没有生气，更没有乐趣。怎么办呢？我七八岁时，祖母就要我学绣花，好将来找一个有钱有势的婆家，这是旧社会女人惟一的出路。可是我抵死不学绣花，决不走前辈女人这条路。我要求母亲让我去读书，我要

099311

像镇上有的女子那样读书，当教员，挣钱养家、养自己，这就是我当时的理想。

段：您家是这么一个境况，读书的要求是怎么样实现的？

罗：由于我苦苦哀求，母亲也朦胧地意识到她自己“命苦”，别再让女儿走这条路，因此，她让我读了小学。我们村在陈家祠堂办了一所初级小学，上初小不花多少钱。我读书从来刻苦用功，自觉地认真听讲，仔细做作业，练书法。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前一二名。现在想起来，我们的老师真好，为了让同学好好学习，给我们讲匡衡凿壁偷光的故事；为了引导我们爱国，给我们讲高丽国被日本侵占后，连用切菜刀的自由都没有，五家合用一把刀。每逢国耻日（5月9日，北洋军阀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的日子），他领着学生，举着小旗，在村里游行，宣传毋忘国耻、民族要自强。初小四年很快过去了。高小设在周庄镇，离门楼下三四里，早去晚归，我都不怕远，就是中午没处吃饭，没处搭伙呀，只得辍学。辍学对我来说实在痛苦。嫁在江阴城里的三姑妈知道我的心事，在征得当家的大伯子的同意，让我到她家附近的县立女子小学上高小，在她家吃住，每学期给她家100斤大米就行了。高小三年，我的成绩在班里一直是名列前茅，只有音乐、体操、图画、手工这四门成绩平平。我的作文好，常受老师嘉奖，经常把我的同全班其他优秀作文一并张贴起来。亲戚们都感到奇怪，怎么男孩子读书都不如“寿大”？

由于我功课好，亲戚们都看得起。但自己家里穷，住在亲戚家总有寄人篱下之感，时时小心谨慎，生怕给人家添麻烦。清早我悄悄地起床，漱洗完毕后盛一碗煮好的稀饭，夹点咸菜，吃完早饭背书包上学去了。中午、晚上回来吃饭，我总是吃一般的蔬菜，从来不住好菜碗里伸筷子。吃完饭，道声“请慢吃”，就回到房里。来了客人，我礼貌地出来招呼一声，就退回房间。我成天不声不响，处处谨言慎行，放学后只在房里看书。他家的大伯对

我说：这个家里好像没有你似的。

上高小二年级时，正赶上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1925年5月30日）。听说上海学生、工人3000多人，为声援日商纱厂工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盘剥屠杀，到租界示威游行，遭到英国巡捕血腥镇压，当场打死示威群众13人，逮捕53人，伤者不计其数。“五卅惨案”消息传来，江阴城里的许多学校学生相继上街游行示威。我们这群十几岁的女学生，反抗日寇的情绪同样十分高涨。纷纷上街游行抗议、宣传抵制东洋货。自己不论是穿的戴的还是用的，只要认定是东洋货，无一例外地拿出来烧掉。我看看自己身上，除了妈妈缝制的衣物外，连国货都买不起，哪有钱买洋货？我正愁着没有东洋货可烧时，突然摸到头发上插着一把化学梳子，这把梳子是三姑妈送的，我特喜爱。我心想中国只产木梳、牛角梳，这花花绿绿的小梳子，肯定是东洋货，便毫不犹豫地取下来，丢进火堆。这是两毛钱买的啦，说烧就烧了？！回去准挨骂。果然，姑妈埋怨了我几句。后来我妈妈知道了，狠狠地训了我一顿。如今回想起来，青年爱国心切，行动果敢，出自肺腑，情真意切。

1926年夏，我从高小毕业。老师说照我的学习成绩看，考中学没问题。我迫切想深造，想继续上学。但是上普通中学要花好多钱，家里拿不出来。只有上师范学校，花钱少些。可是钱虽少，家里也着实困难呀，上学是惟一出路，我决心不顾一切，要求上学。当时江苏有两所著名的女子中等师范学校，一所在南京，一所在苏州。苏州离我家近，我便选择了苏州的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即现在的新苏师范前身），妈妈不想让我继续升学，原因是穷，还有两个常年病人。一个妇人人家，独自挑着全家生计的重担，确实艰难啦。妈妈要我去当小学教员，她说，离家近，每月薪水20元钱，一笔不少的收入。我说哪有小学毕业教小学的，凭着非上学不可。我粗略计算：从江阴到苏州，车费2元，来回4元，加上报名费1元，共5元钱。师范学校不收学生的伙食费，

还发两身校服，学生每学期只需交学杂费 24 元。现在家里钱不够，借了债，我将来还。祖母更不同意我上学，说：“没钱只好卖田，把田卖光了，家里人吃什么？穿什么？日后你出嫁拿什么陪送？”我说：“我出嫁连一粒木屑屑都不要，我只要读书。”妈妈拗不过我，让我去考，考中了再想法子，考不中也死了我的心。噫！我的运气特好，没费多大力气，到苏州一考就被录取了。我兴高采烈地回家，妈妈眉更愁脸更苦了。我上师范这六年，是妈妈最苦的时候，既要为两个残疾人治病、抓药，又要为我上学凑钱，她自己在家纺纱织布，到地里劳动。一双小脚，到地里种桑锄草，我看了心痛，放假时我总帮着劳动，多挣几个钱。

1926 年我刚进苏女师，那时候师范生膳食免费供应。第二年（1927 年）下学期，听高年级同学说：“国民革命成功了”，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我不知道这个政府到底是好还是坏，只知道我们学校改名叫苏州女子中学，原师范班改成师范科。最叫我震惊的是学生要交膳食费了。校方说：“你们在家也吃饭，难道上师范就白吃饭？”这样，每学期得交 20 多元伙食费，这对我来说，真不堪重负呀！我对成立“国民政府”哪能高兴得起来。妈妈为了支撑爱女求学，日夜纺织，还得求亲告友，四方筹措。那时学校规定，每两周放假一天，学生可外出游玩办事。家境较好的同学，常在假日结伴上街，看场电影（那时只有无声电影），吃盘蛋炒饭，随意游览一番，过一个自由自在的假日。我真想去，可哪儿也不敢去。没钱啦，出去干啥。眼不见，心不烦。一般地说，苏女师招的学生，素质较高，校风较好。教师阵容可观，其中还有几位进步老师，他们学识长，师德高。当时在同学中颇孚声望的有：孙其敏（即现在的孙起孟，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教西洋史、哲学、文字学；曹养吾，教文学；朱秉衡，教哲学、教育学，兼高中师范科主任；陈旭伦是教务主任等。所以说这几位老师开明，是他们反对学生死读书，读死书，鼓励自由阅读，独立思